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 编

# 张公瑾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ZHANG GONGJIN



卷一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 编

# 张公瑾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ZHANG GONGJIN

## 卷一

语言学理论与方法

少数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古籍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公瑾文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编.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81108-742-0

I. ①张… II. ①中… III. ①少数民族—中国—文集  
IV. ①K2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6273 号

## 张公瑾文集·卷一

---

编者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责任编辑 戴佩丽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版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行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厂 北京宏伟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01.5  
字数 160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1108-742-0  
定价 330.00 元(全三卷)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张公瑾先生

## 自序

这套文集马上就要付印了。原来我并没有出文集的打算，现在看到快要见书了，心中难免泛起一丝由衷的喜悦。不管怎么说，这里汇集了我一生耕耘成果的精华，觉得还是有一点意思的。

文集大体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第二部分是少数民族古籍；第三部分是傣族研究；第四部分是杂文、序言之类。从我个人的学术生涯来说，傣族研究，特别是傣族语言文字的研究是我的立身之本，我是从这里开始走上自己的学术之路的，照理应是一开卷就能看到傣族研究的成果。但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却是最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结晶，也是学界比较关注的话题，而民族古籍方面的研究，涉及我国各民族，涉及面也更宽些，所以现在这种安排的方法也是合适的。但为文集写序言的时候，我还是先从傣族研究说起。

1951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在北京成立，当时我在上海复旦大学社会系学习。华东教育厅下发一个文件，说要从大学一、二年级学生中招收学生来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少数民族语文，毕业后到民族地区从事民族工作。由于青年时代对祖国边疆的向往，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经批准后就于11月初来到了首都北京，开始与民族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来到中央民族学院之初，我被分配学习布依语，同时接受语言学和语音学的严格训练。1952年8月，调来了傣族教师方伯龙。当时教民族语的教师都还没有教学经验，需要一个学过语言学的人配合他一起编教材，对学生进行辅导。这样我就被调出来与方伯龙同志合作，提前学傣语傣文，并一起编教材，作辅导，开始了傣语教学工作。过了不久，又调来了孟尊贤同志，我又多了一位良师益友。不过，那时学的是傣语德宏方言。到了1955年，从西双版纳调来了刀新华同志，我又从事傣语西双版纳方言的学习与研究，一直延续至今。那时西双版纳还叫十二版纳，是非常神奇、令人向往的地方。1958年初我和刀新华同志带领

学生到西双版纳实习，与傣族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接着我们又参加了社会历史调查，一直到1959年夏天才回到北京。在西双版纳实习和调查的一年半时间，摆脱了在北京时不停的批评和检讨的压抑气氛。作为一个熟悉当地民族语言的汉族人，与当地傣族同胞亲密相处，真是自由自在，如鱼得水。那是我意气风发，发挥才华的一段美好时光。回想起来，如果没有那一段经历，我的青年时代会是多么的暗淡。正是那一段经历，奠定了我后来长期从事傣族研究的基础。也就是在西双版纳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傣语“au”的来源和用法》一文在中华书局的《民族语文论集》上发表了。虽然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这篇论文并不重要，但它是我的第一篇论文，此后要等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接着公开发表其他文章。而且这篇文章还得到两个人的关注。一位是高名凯先生，他为我修改过，并提了珍贵的意见。第二位是孟尊贤老师，他为我核对并补充了材料。因为这篇文章是用德宏傣语的材料写的，在孟尊贤老师的认真核对，保证材料无误之后，我才敢拿出来发表。

值得一提的还有另一篇文章《论汉语与壮侗语族诸语言中的单位词》。这篇文章写定于1957年，在手里搁了20年，中间经过4次修改，到1978年才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1980年才全文发表。这篇文章是我用力最多的一篇，发表后也有一定的社会反响。这篇文章的经历只是告诉我一个道理：要耐得住性子，不怕挫折。

在我研究傣族语言文化的过程中，孟尊贤老师和刀新华老师对我非常重要。他们与我有共同爱好，有共同语言。我们能够经常讨论问题，交流心得，解决教学过程中的疑难问题。他们都是我合作的同事，从来没有师生关系，但我是从他们学习傣语的，他们也是我傣语文的启蒙老师。后来我在老傣文方面的长进，又得力于1958年在社会历史调查中刀建德和岩罕光两位在景洪文物室中帮我解难释疑的傣族老师，和1975年在天文历法调查中的西双版纳报社的岩鹏（或作岩捧）老师。如今只有孟尊贤老师仍与我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经常有机会切磋琢磨，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

傣语的研究，我都是从教学过程中受到启发，为教学需要而进行的。所以我的研究文章的重点都在傣语语法方面，特别是汉藏语系语言中最具特点的语序问题。当年在教学过程中，我编了一部傣语语法教

材，就是文集中首次收录的《傣语语法通论》。我原来上课时讲的内容要多得多，写定时省去了许多具体内容，而且，这只是全书的前半部，后面还有一个《虚词论》，原来上课时已讲过，也已经有了一个草稿，它对学习傣语非常重要。所以我想把前部分补充完，后部分再写定，然后再拿去出版。但时间很快过去，现在再去完成它，看来是不可能了。最近再把前部分的油印稿拿出来看了看，觉得虽未尽意，仍有可参考之处。这部通论的价值就在于我在许多地方，不仅讲了一句话傣语这么说，还讲了不能那么说，一个词能够这么用，不能那么用。这样的写法，如果不是结合教学实际，怕也是不容易写出来的，所以觉得还有一些价值，就把它收进来了。

傣语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傣文却有更大的研究空间。我国德宏傣文和西双版纳傣文都有新老两种。新傣文是现实应用的文字，而老傣文记载了大量历史资料，更是研究的宝库。1958年我在景洪文物室查阅老傣文资料时，目的是查阅社会历史资料，为当时的社会历史调查服务，很少去关心宗教资料，也很少涉及天文历法方面的东西。而且这两者难度很大，当时还不敢问津。1975年，当时的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邀我去帮助他们编馆藏的傣文文献目录，使我有机会接触大量傣文历史和宗教文献。我找到了水野弘元的《南传大藏经总索引》，后来又在曼谷买到了一册《汉梵英泰佛学辞典》，使我对傣文佛典的汉译有了科学的依据。也在197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邀我参加他们的“少数民族天文历法”研究项目，从此我开始了解傣族的天文历法及其文献。1980年，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成立。1983年，我成为教育部（当时是国家教委）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此后，我逐步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老傣文古籍的研究上来。我主要做了几件事：编译了北京各单位所藏的老傣文文献目录，摸清了国内贝叶经的保存情况，编了部分傣文文献图谱，翻译了《续渤海史——近百年大事记》，译注了两部傣文的天文学文献。

在所有这些工作中，意义最大的是两部天文学文献《苏定》和《历法占卜要略》的译注，并写了解释性的《傣历中的纪元纪时法》一文。我把两部文献中的计算程序公式化了，从而解开了傣族天文学的计算数据的奥秘。有了这一套公式，就能计算出每年的泼水节日期，八月份的大小，当

年有无闰月，等等，还能计算各种天体的运行位置。我编过两册年历表，一册是《傣历、公历、农历百年对照年历》，这是完全按计算公式推算的；另一册是《西双版纳傣历年历汇编》，这是按照多本已有的傣历年历表译成汉文，汇拢成册，是一册二百多年的年历表。后者原来只是油印本，因为它保留了传统傣文历书的原貌，这次文集中也收录进来了。

由于有傣文古籍开路，我逐渐地进入了少数民族古籍的领域。随着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和国家教委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国家民委系统性的古籍工作的开展，我很快就卷入到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中来。我发现这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有多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资源就保藏在少数民族古籍之中。于是我把民族古籍作为自己工作的重要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2006年我所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解》出版，这部书集中了各文种专家的智慧，以词条的形式全面介绍了我国各民族具有代表性的古籍精品，共收录精选的4000多个条目，涉及各种民族文字书写的古籍和价值较高的口传文献，内容丰富，准确地介绍了有关古籍的作者、时间、内容、版本等特点，对当时开展的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2007年文化部成立“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我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又被聘为中国文字博物馆专家委员会委员。在这方面工作规模最大的是参加国家民委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的编辑工作，由我担任主编。这项工作从1996年开始，至今已编印出版24册，全套书出齐估计会有六七十册。这套书的工作流程是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向省、区、市民委古籍办布置任务，各地古籍办组织编写人员撰稿，初稿完成后转到我手里，由我和几位副主编审阅，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责任编辑与撰写人共同改定出版。我在审阅过程中，一方面按照我们原定的“编写纲要”提出修改意见，一方面在审读过程中也可以学习到很多知识，了解到很多情况。每读一册书稿，都使我对这个民族的文化积累和历史上的贡献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如今我最感遗憾的是没有及时在每一册阅读之后，写一篇“编辑手记”，把阅读过程得到的启发和心得记录下来。今后还要出几十册，我想补做这个工作，不知道能否做成。



论思维的结晶。在我刚刚来到民族学院的时候，当时主持我们语文班学习的马学良先生对我们进行了严格的语言学技能训练。从听音、辨音、记音到归纳音位系统，制订文字方案一系列技术性过程，都经过反复的练习。这为我们后来步入语言学的殿堂铺好了基石，我们后来在语言学方面的任何进步，都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的。还有高名凯先生，1952年我刚刚留下来工作的时候，就和一起留下的两位同事到北京大学听高先生的课，后来民族学院又把高先生请来上课。我陆续听了他的“语言学概论”和“普通语言学”两门课。那两年我还听了北京大学大量语言学方面的课程，只有高先生的课留给我的印象最深。高先生的课不仅语言清晰生动，最主要的还是他在理论上的探索吸引着我。从1952年到1957年，我和高先生一直保持着经常的往来，他还为我看过稿子，写过意见。但1957年之后，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我们就不再联系了。直至1965年初我在四川凉山四清的时候，看到《人民日报》上一块小小的讣告，知道高先生去世了，当时他才55岁。

改革开放之后，我在系里系外既上傣语课，也上语言学概论课。当时民族学系的林耀华先生邀我给他们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语言学概论课，我考虑到民族学系的特点，就把民族文化结合进来讲，效果还不错，我自己也从中得到很多启发，于是在1982年写了《社会语言学与中国民族史研究》。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现实语言中存在的问题，民族史研究的是历史上的问题，本来两者并无联系。我这是硬把社会语言学拉扯到历史上去，很是勉强，所以我只得说，这是把社会语言学从共时推广应用于历时研究。其实我当时也考虑过使用文化语言学这个术语，但觉得这太陌生，没有人用过，不敢用。没过几年，上海一些年轻人就用了这个学科名称，而且很快就用开了。我也就跟着用上了。这说明当时我们这一代人到底不如年轻人。这个学科应该说从罗常培写《语言与文化》一书就开始了，只是他当时只停留在词汇研究上，我则把它应用于语音、语法、语言类型、语言系属、地理分布及古代文字诸方面。1998年我出版了《文化语言学发凡》一书。这书是我此前所写若干论文的汇拢，其中收录了一些当时有一定影响的论文，如《语言的文化价值》、《走向21世纪的语言科学》等，也收录了一些未发表过的重要论文，如《语言的文化气质》、《历史语言学的历史命运》等。《历史语言

学的历史命运》一文在原书中原来放在倒数第二篇，现觉得历史语言学有承前启后的意义，这次排印时把它调整到全书的最后。书中也涉及一些浑沌学问题，但还没有展开。20世纪90年代初，我把浑沌学理论和方法引用到语言学研究中来，这是语言学方法的一场改革，其影响将逐渐显示出来。此后我结合几次有关问题的讨论会，写了《文化语言学的时代课题和浑沌学在语言学中的应用》、《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新视野》、《语言学思维框架的转换》、《继承与创新——传统语言学著作中的浑沌学思想资源》、《分形、自相似性与异物同构原则》等论文，进一步阐释浑沌学思想。这些文章都已收进了这个文集。与此同时，文集中我也收进了一篇《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阐明的语言学思想》。这篇文章写于“文化大革命”中，行文中不时流露出当时的时代气息，我本来不想收了，但一想这些年来竟然没有人注意恩格斯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实在觉得遗憾，于是决定把这篇文章收进来了。

我的语言学理论研究常常带有跨学科的性质，文化与语言的结合是跨学科的，浑沌学与语言学的结合也是跨学科的。我常常要求我的学生在看非语言学的书的时候想语言学问题，在看语言学的书的时候想非语言学的问题，这才有可能借鉴别的学科的成就来刺激本学科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有一定的理论兴趣。培养自己的理论爱好，这是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必要前提。语言学研究也像其他学科一样，关键依然是多读几本书，多联系具体实际，自然会有新的想法出来。

文集中所收录的文章是经过我自己几番筛选的。文集不收录的文章有这么几种情况：1. 时间性很强的一些文章，时间过了也就没有多少意义了，不予收录；2. 内容与其他文章接近，或基本内容有重复之处，收了一篇或一部分就不收另一篇或另一部分了（这部分还没有完全做彻底，因为有些地方实在无法删节）；3. 文集是针对国内读者的，所以，用外文发表的文章，都没有收；4. 资料性的作品原则上不收，如傣语方言方面的资料，谚语、词汇资料等；5. 合作的文章，凡不是我执笔完成的，不收；6. 非学术性的文章或译文，如傣文长诗、童话、寓言之类，不收。

由于文集中所收录的文章跨越五六十年，有些术语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写法，现在统一起来难度很大，如傣文中的“傣那文”又作“傣纳文”、“傣哪文”，至今人们仍有不同写法，还有“毛南族”以前作“毛

难族”，“壮族”以前作“僮族”等，有的是考虑当时的历史情况不便改，有的是想改没有完全改过来，特此说明。

80年的时光匆匆过去，回顾起来觉得做的事情太少了。我的青年时代是在不停的各种运动中过去的，下乡和劳动占去了很多时光。当时下乡不是一个月半个月，而是一年两年。20世纪50年代的实习与调查是很有必要的，但进入60年代之后，我在校农场的劳动就是两年，两期四清也是两年，十年的“文革”中多数时间做不了事情，其中在干校劳动一年半。而且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特别是60年代初那一段劳动时间，我也深深体会到重体力劳动和极度饥饿感的真正滋味。但今天回想起来，一点也没有遗憾，自己好像觉得什么都是不可缺少的。正因为有了这些经历，后来遇到的各种困难就都算不上什么了；也正因为有了这些经历，我才是现在的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我想起佛家的一首《西江月》，它的后四句是这样的：“有用用中无用，无功功里施功，还似果熟自然红，莫问如何修种。”人生中有些看似很有用处的事，常常是没有用的，有些看似没有功效的事，到时候常常是很有用处的。一切都听其自然吧，只要永远有一颗进取的心。这既符合我的浑沌学思想，也符合我的人生理念。

文化语言学、民族古籍和傣族研究这三个领域的工作现在已有很多人人在做，后人一定比前人做得更好。但有时又有一点疑惑，比如我的傣族天文历法的研究，还有人能做下去吗？这需要几个条件，第一是要懂老傣文，第二是要懂一点天文学知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乃是有集中精力做一件事的决心和时间。现在人人都是忙人，谁能安下心来从事那样复杂的计算？谁能用几年时间不计回报做一件默默无闻的工作？但回过头来想，玛雅文的历法都有人解得开，傣族天文历法的难度显然要小得多，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长江后浪推前浪，后人总比前人强。在课堂上我曾对我的学生说，对老师的最大的回报和鼓舞，就是能培养出超过自己的学生，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

回想了以前的一些事，写了上面这些，就算作这个文集的序言了。谢谢读了这个序言的人。

张公瑾

2013年2月

7

# 目 录



## 语言学理论与方法

文化语言学的性质和任务·····	3
文化语言学与民族语言研究·····	12
文化语言学视野中的民族语言研究·····	16
语言的生态环境·····	24
语言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33
物质文化史在语言中的积淀·····	41
文化语言学的时代课题和浑沌学在语言学中的运用·····	48
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的新视野·····	52
语言学思维框架的转换·····	59
继承与创新·····	65
构建文化语言学的方法论体系·····	73
分形、自相似性与“异物同构性原则”·····	75
多彩的语言世界与汉语的价值和地位·····	82
我国的民族语言政策与语言民族学发展的新趋势·····	91
我国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与民族文化·····	98
民族语言文字保护与使用·····	113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阐明的语言学思想·····	130
文化语言学发凡·····	137

## 少数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古籍

中国文化的共同渊源及其多民族特点·····	325
-----------------------	-----

绚丽多姿的中国民族古文字·····	340
民族古籍与民族古籍学·····	346
民族古籍开发与民族语文工作·····	357
史诗研究与古籍整理·····	363
对制定民族古籍整理规划的几点意见·····	368
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绚丽篇章·····	374
云南与中南半岛跨境民族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走向·····	378
关于我国民族名称和语言名称外文译名的统一问题·····	387
少数民族文学纵横关系论·····	395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接轨·····	407

# 语言学理论与方法



## 文化语言学的性质和任务\*

文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的一个综合性的语言学科。文化性质指语言本身就是文化，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价值指语言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是体现文化和认识文化的一个信息系统。这个学科虽然具有某些边缘特点，但从理论到方法都是以语言为基点的，所以说它是一个语言学科。由于这个学科具有思想来源的多元性、研究对象的多元性和研究方法的多元性，所以它具有广泛的综合性。

### 一、关于语言的文化性质

长期以来我们都习惯于说，语言是社会现象，这是不成问题的。一切社会现象都是文化现象，一般说来，这也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过去已有一个先入之见，认为语言与文化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语言学概论”课只讲语言不是基础，不是上层建筑，语言没有阶级性，并不着力去揭示语言的文化性质。

我们把语言只看成是一种交际工具，它的功用就是交流思想。信息论把语言的交际过程简化为这样一个程式：“编码—发送—传递—接收—解码”的过程，隐藏在这个过程中的文化意义，完全被人们忽视了。至于这个过程之外的文化价值，更是结构主义者不愿理会的。

说语言是文化现象，首先因为它是人类的创造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果之一。《辞海》中解释“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语言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创造的，当然属于文化之列。顺便说一下，自古至今“文化”的定义不计其数，

---

\* 原题《关于文化语言学的几个理论问题》，载《民族语文》，1992（6），又载，陈建民、谭志明主编：《语言与文化多学科研究》，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



《辞海》中的“文化”定义不是很全面的，它没有把人的活动能力即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包括进去。这个问题当另找机会论述。但语言作为人类适应环境的成果，又是各民族对特定环境的一种适应能力，它理应成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次，文化作为人类的创造活动和知识的积累，其最基本的特性之一是习得性。语言是习得的，它不是人的本能，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遗传的，而是在人的认识活动中形成和完善的，是必须经过学习才能掌握的，所以它具有文化最基本的特性。

第三，语言作为符号体系，属于人类所特有的第二信号系统。猴子的叫声同人类语言的区别是前者没有符号性机能。作为符号系统，它不仅是意义的代码，而且是文化的代码，语言系统本身也是一个文化系统。

第四，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不全面的，因为载体就是盛载东西的物体，是运载其他物质的工具。可供载运的物质是独立存在的。载体与运载物既可分别存在，也可用别的载体和运载物进行替换。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则不同，因为一切文化活动和文化创造都离不开语言的作用，所以文化的积累也都保存在信息系统之中，这是任何载体都不可能相提并论的。由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的成果凝聚在语言之中，因此可以说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以已有的文化成果为起点，而最主要的是以巩固在语言信息中的文化成果为起点，所以，语言不仅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总体中最核心的部分。

第五，文化的发展水平与语言的丰富和准确程度是平行对应的。语言是文化发展的成果，文化又借语言而得以发展。语言的发展水平是以其丰富和准确程度来衡量的，而这一点并不决定于语言本身的类型，而是决定于该民族的文化发展水平。因此，语言不是文化之外游离存在的客体，而是文化整体中有其自身结构，而且自成体系的特殊部分。

这是对语言性质的再认识，一个学科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对自己研究对象认识的深化。当葆朴把语言看作一种自然现象时，他便致力于揭示语言的机械规律和物理规律；当施莱哈尔将语言理解为一种有机体时，他的研究便集中在描写语言在其生长（形成）和死亡（解体）阶段的生